



贾钢涛 著

嬗变与重塑

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

1949—1966

SHAN BIAN YU CHONG SU:
MAO ZE DONG NONG MIN JIAO YU LI LUN
HE SHI JIAN YAN JIU 1949-196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贾钢涛 / 著

嬗变与重塑

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

1949—1966

SHANBIAN YU CHONGSU
MAO ZE DONG NONGCUN JIAOYU LILUN
HE SHI JIAN YANJIU 1949-196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嬗变与重塑：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1949—1966）/
贾钢涛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923 - 5

I. ①嬗… II. ①贾… III. ①毛泽东教育思想—农村教育—
研究—1949 ~ 1966 IV. ①A841.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326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高 婷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36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0B10）
陕西科技大学青年学术骨干培育计划（XSG2010018）资助

序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传统农业遭到冲击，乡村社会秩序开始瓦解，农民生活日益困顿，由此，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逐步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同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将目光转移到乡村，发现和建构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前者循例改良路径，深入乡村，实施乡村建设（教育），力图借以拯救中国；后者效法俄国“十月革命”，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并经过长期努力探索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农民革命家”毛泽东的“横空出世”，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学者从多维度阐释、分析、解读毛泽东思想，其中毛泽东的农民观尤为大家所瞩目。

近年来从学术界来看，“农民教育”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其中，对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教育理论及实践探讨得较多一些，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郑以灵和温锐对毛泽东农民观的研究，前者从几个大的时段对毛泽东农民观进行了阐释；后者运用大量的材料论证毛泽东晚年农民理论如何走向误区，他们的研究为毛泽东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许启贤、张耀灿、刘建军、王树荫等编辑、出版了若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教材，其中也涉及毛泽东对农民教育的一些论述，为后续研究丰富了资料、思路和论域。同时，一些硕士、博士以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或相关问题）作为学位论文选题，进一步充实和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但上述研究略有不足，一是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前，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农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关注不多；二是从研究范式来看，

2 嬗变与重塑：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1949—1966）

随着“现代化”范式流行，“革命史学”范式式微，而单一范式的独尊必然造成结论的片面；三是从材料运用看，“史学”研究之基础在于史料，而已有研究中第一手材料的运用还不够充分。当然，这也与档案的开放度不够有一定的关系。

贾钢涛博士的专著《嬗变与重塑：毛泽东农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1949—1966）》，以1949—1966年毛泽东农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考察对象，不失为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论题。本书以农民身份变迁（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权利）为切入点，以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及其建设的历史进程为主线，将论题置于新中国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历史（“土改”、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把握，勾勒出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产生的特定背景及发展轨迹，对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的内涵进行了提炼，对其农民教育理论实践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了许多颇具新意的论断。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沿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理论预设出发，提出文化教育主要以农民识字扫盲为中心，旨在使农民知识化；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农民社会主义意识为核心，旨在使农民“又红又专”，并运用党的领导与激发群众意愿相结合、典型示范与群体推进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方式，借助大众媒体、冬学和政治运动等载体，开展了形式多样、声势浩大的农民教育实践，其成效是显著的。但是，毛泽东泛政治化的农民教育实践和理想化的农民教育目标建构也使得农民教育衍生出一些负面效应。农民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生存状态的改善与农民教育的效果呈正相关关系，而生活水平下降和预期的反差则导致农民的不满及“退社风潮”等各种“逆行为”。“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所期望广大农民“准备过苦日子”的动员与农民现实利益的诉求内在的紧张“不断生长”。由此可见，在农民教育问题上，必须辩证地认识农民的两种积极性，从农民实际出发；必须坚持充分尊重农民利益，始终做到以民生为本；必须尊重教育规律，慎用运动的方式。

概言之，贾钢涛的这部专著在认真梳理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史学等研究方法，拓展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域，从研究视角到研究内容都有较大的创新。学无止境。作者的研究为其后续的研究

究开了一个好头。在他沿着学术阶梯努力攀登的时候，又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文化教育研究（1935—1948）”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相信他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会取得更大成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凤城

2012年8月25日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	(29)
第一节 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的形成	(29)
第二节 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	(64)
第三节 毛泽东“发现”农民的政治学意义	(76)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的社会背景	(87)
第一节 “两个转变”同时并举	(88)
第二节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97)
第三节 小农对于“社会主义”的抉择	(105)
第四节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134)
第三章 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文化教育旨在使农民知识化	(147)
第一节 识字扫盲与农民文化教育	(148)
第二节 职业技能教育	(174)
第四章 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重在使农民 “又红又专”	(179)
第一节 社会主义教育	(180)
第二节 爱国主义教育	(208)
第三节 做一个“好社员”	(212)
第四节 又红又专、红专结合	(220)

2 嬗变与重塑：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1949—1966）

第五节 评析	(225)
第五章 毛泽东农民教育实践的载体	(230)
第一节 政治运动	(230)
第二节 大众媒体	(232)
第三节 冬学	(250)
第六章 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价值	(253)
第一节 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的历史价值	(254)
第二节 毛泽东农民教育实践之憾	(277)
第三节 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的当代意义	(295)
结语 乡土中国革命与现代化互动镜像中的农民教育及其 历史反思	(310)
参考文献	(315)
后记	(321)

导 论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郑德荣先生指出：“毛泽东的一生特别关注和重视农民问题，他的理论著述和实践历程相当分量与农民直接相关。”^① 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特殊意义”的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由于其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独创性，成为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下，在“土改”、抗美援朝、合作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顺利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过渡，农民教育功不可没。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的研究正日益被学界关注和重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党史、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同时，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为主的泱泱大国，素有“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②之说。美国著名学者埃弗里特·M. 罗吉斯曾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③

（一）研究背景

本书属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前沿课题。党的十七大提出，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实现“农

① 吴敏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 温铁军：《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学习月刊》2007年第1期。

③ [美]埃弗里特·M. 罗吉斯：《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页。

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农村改革到2020年的基本目标。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主动回应农村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迫切需要，还是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对文化实力是一国软实力的深刻理解的结果。

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农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有助于深入把握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的内涵，而且也对当前农民教育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其紧迫性和重要性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说明：

首先，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农民主体意识增强和利益的分化将引发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加强和改进农民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艰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农村取消农业税，农民经济地位提高、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同时，高新科技和信息传播的便捷，农民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也日趋多样化。这为官方话语表达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嵌入提供了便利，但也使加强和改进农民思想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变得愈加艰难。^①学习和借鉴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建构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农民教育新模式，才能使培育“新型农民”的目标真正落到实处。

其次，封建传统习俗和宗法意识根深蒂固，对现代市场意识的塑造无异于一道天然的屏障，重构新型农村契约关系、确保农村和谐稳定任重道远。

伴随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相对封闭的村庄体系开始解体，“现代性”对农村和农民文化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式微，农村和农民在社会和文化上呈现边缘化趋势，农民主体性逐步丧失，农民普遍的无力感、无根感和焦虑感随之而来。近年来，各地农村

^①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农村和农民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使得党在农村的意识形态工作变得更加严峻。其中，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等宗教在农村的广泛传播；传统封建腐朽没落思想的延续；部分困难群体对社会产生的失望、怀疑和抵触情绪等，使得部分农民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怀疑和动摇，致使党在农村的主流意识形态遭到侵蚀，凝聚力有所下降，认同感有所淡化，党的执政基础遭到削弱。

封建迷信沉渣泛起、黑恶势力若隐若现，封建习俗和宗法意识仍然根深蒂固，^① 农民“有组织抗争”^② 此起彼伏，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农村改革成果，使得处于“断裂的乡村”^③ 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预见，重构新型乡村契约关系和价值体系、确保农村和谐稳定刻不容缓。

再次，继承并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关于农民教育的理论学说，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识，增强党在农村的影响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摆在理论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农民始终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问题也始终是毛泽东毕其一生着力解决的主要议题。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形成和发展了丰富的农民教育理论，推动了新中国农民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乡村“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④ 近年来，中国乡村爆发的几件大规模的农民群体性事件^⑤ 似乎印证了塞缪尔·亨廷顿著名的“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导致不稳定”^⑥ 的命题的正确性。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固然有多种诱致性因素，但根本在于由于伴随改革的深入而农民呈现边缘化和弱势化。理论研究者的使命在于科学揭示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的内涵，辩证分析和评价其农民教育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从而对当今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文化发展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二）研究意义

当前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阶段，传

① 近年来农村出现了各种前所未有、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丧事上表演脱衣舞，丧心病狂地虐待父母，地下六合彩的全国泛滥，地下邪教的快速传播等。参见陈柏峰、郭俊霞《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皖北李峪村调查》，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

② 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 H 县调查》，《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 3 期。

③ 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4 页。

④ 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 页。

⑤ 仅 2008 年就发生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农民群体性事件。

⑥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1 页。

统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已遭到强烈冲击，新农村建设正有序推进。选择“毛泽东农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1949—1966）”这一论题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理论意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课题之一，探讨、分析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解决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教育（动员）上所作的理论贡献，进一步深化和丰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内容；加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丰富的理论源泉。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毛泽东思想体系颇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农民教育观的关注不够。显然，推进该领域的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且可以为新时期理论创新提供理论素材。

实践意义：有助于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培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尤其是可以从20世纪50年代的新农村建设中汲取直接的实践资源和有益的启示；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毛泽东关注农民问题的良苦用心，以求全党和全国上下都来关注、关心、支持农民教育，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二 文献综述^①

（一）国外研究现状

现有的文献资料，还没有看到国外学者系统研究毛泽东农民教育的专门著作。不过，学者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毛泽东的农民教育理论（观）和实践也有所论及，相关的一些论点也颇具新意。

1. 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状况的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道路选择的历史动因、土地

^① 此部分综述主要是依据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馆藏文献以及 Elsevier 数据库、EBSCO 电子期刊数据库、牛津大学期刊网和中国知网数据、超星电子图书等电子文献以及现有研究资料经过分析、整理而成。

改革以及合作化的评价、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等问题展开相关研究，尤其是对“大跃进”关注较多。

关于新中国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自主选择还是受苏联影响，美国学者弗兰兹·舒尔曼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一书中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初的苏化倾向，他认为：“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在国际上是‘一边倒’，也在实质上执行着一种斯大林主义战略。其后果表现为：严格的等级制管理，迅速重工业化的投资方式，忽视乡村的农业生产。”^①但罗纳德·基思在《中国季刊》上发表《边区经济对1949—1952年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一文，强调了“延安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把40年代创造的边区经验创造性地移植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更高水平上，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观点和组织方法上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1951年的经济财政组织的运转中尤为明显。而且，从其组织体制、“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和把群众路线凌驾于经济组织之上等方面来说，“延安道路”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算是重新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因而不能说是中国在50年代优化运用了苏联经验，而应指出50年代早期把延安革命经验转而应用到全国性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②

关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的评价。多数学者都认为，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而不在于经济发展，而合作化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基本上还是符合农村实际的。日本学者田中恭子认为，土地改革的主要意义在于党和国家的权力渗透而不是经济发展。^③在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历程中，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其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再分配的手段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更在于国家权力的实质性扩张、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塑、各种动员和治理技术的发明，从而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① 梁怡、李向前等主编：《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② 同上。

③ 秦燕、贾钢涛：《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1949—1966）研究述评》，《科学·经济·社会》2012年第2期。

的宏伟开端。

日本学者内山雅生考察了华北地区农村的集体化，他指出：“互助组的建立，主要是社会的需求。也就是说，在共产党自上而下强行要求实现集体化这一事实背后，还有这样的实情：对于正处在生产力发展比较低的阶段的农民来说，他们不得不承认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集体化，以便找到出路。”他进而认为：“至少到互助组那个阶段，集体化的推行是与农民的主体意志相一致的。”^① 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等人运用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以华北武公村为考察对象，认为该村“在40年代参与了从文化上倡导并为农民接受的合作模式，在50年代提倡走苏联集体化道路，以及此后更多的教条主义政策。在群众自愿改革和合作的时代，它的历史与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悲惨结局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铲除任何固有的私有财产、习俗和市场记忆与共产主义价值观不一致的观念的教条主义政策，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使经济陷入了泥潭，甚至把经济推入可怕的倒退之中。”^②

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农民长期贫苦与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特殊体制形成具有很大关系。他声称，“解放后的新中国从理论还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都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小农生产抱有一定的成见。……新政权迅速地确立了计划经济和集体生产的制度，粮食和棉布市场置于‘统购统销’政策之下，不断地将控制扩大到农村生产，先是定产订购，继而把所有农户集体化。生产队接管了家庭的经济决策权，而国家政权又以极其详细的生产和征购指令来指挥生产队”。他由此推断出，正是这种战略推进的失败，导致了中国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低迷，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形成，中国农民陷入贫穷状态。^③ 在黄宗智的研究著述和话语逻辑中，以“中国的小农”指代中国农民，并认为其既不完全像恰亚诺夫等实体主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计生产者，也不完

① [日] 内山雅生：《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刑丽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页。

② [美] 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③ [美] 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全是像铂金斯和西奥多·舒尔茨等形式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种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的农民”。“中国的小农”介于两者之间，或是两者的结合，他们既为自己的日常消费而生产，同时也具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特点。^① 90年代，他又出版了《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的发展》这一力作，对该地区50—80年代实行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进行了深度扫描，对上述结论进一步阐述。他最后强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防止资本主义的出现，但并没有解决小农经济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大跃进”发生的原因。代表性的观点有“毛掌控说”、“路线斗争说”、“循环说”、“革命遗产说”等。“毛掌控说”以美国学者晁国春、日本学者宇野重昭为代表。前者认为，“大跃进”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集体领导的产物，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高层是高度团结的，即使有分歧，也不是路线之争”。^② 后者指出，“大跃进政策是乌托邦式的东西。这种政策被采纳，是因为有毛泽东的强有力的指导。干部和中央官僚机构都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特别是包括专家在内的官僚机构，也不能进行阻止”。^③ “路线斗争说”以英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白瑞琪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注重群众运动和思想激励的“左派”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物质刺激和经济挂帅的“右派”路线，具体表现为“解放力量”对抗“有组织的动员”、^④ “革命现代化”对抗“管理现代化”、^⑤ “农村模式”与“城市模式”^⑥ 之争。“循环说”认为，“大跃

① [美] 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② Chao Kuo - chun,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21, *Contemporary China and Chinese* (Jan, 1959) .

③ 梁怡、李向前等主编：《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

④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⑤ John. H. Kautsky, “Revolutionary and Managerial Elites in Modernizing Regim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 Jul, 1969.

⑥ Ahn, byung - joo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ynamics of Policy Processes*,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 1976, pp. 15 - 16.

进”只不过是中國无数次运动的循环而已。美国学者 G. 威廉·施坚雅、温克勒将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历史划分为“激进”与“去激进”的循环，每一循环涵盖动员、高潮、紧缩等阶段。^①“革命遗产说”认为，“大跃进”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的延续和再现。他们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工合组织。傅尧乐认为，“大跃进”时期将延安经验“辛勤劳动和政治可靠比技术更重要，通才与业余爱好者比专家和技术人才更有价值”的“粗陋的平均主义精神”加以固化、放大，这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思想基础。^②所罗门也认为，“大跃进”就是要恢复延安传统。^③

关于对“大跃进”的评价。国外学者主要有肯定、否定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论。

持基本肯定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日本学者国分良成，他认为“大跃进”兼有“革命”和“建设”的双重功能，作为向苏联模式学习的做法诀别的结果，把自力更生精神作为支柱，力求探索中国独自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倾向很明显。这可以从不是偏重于重工业，而是工农业同时发展；不是中央集权一条腿走路，而是引进分权化，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下放劳动等方面表现出来。这种变化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带来的各种弊病进行反作用的结果。^④尼克·奈特认为，在 50—60 年代，“毛力图制定另一种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就与延安时期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相比，“如果说没有超过也是毫不逊色”。^⑤2003 年 10 月，法国著名学者、“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在美国著名左翼刊物《每月评论》上撰文论述世界日益严

① G. William Skinner, Edwin A. Wincker, “Compliance Succession In Rural Communist China: A Cyclical Theory”, in Etzioni, Amitai ed, *A Sociological Reader on Complex Organization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0, pp. 401 - 423.

② B. Michael Frolic, “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Social Forces*, Vol. 57, No. 2, Dec., 1978.

③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341 - 343.

④ 梁怡、李向前等主编：《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0 页。

⑤ [澳]尼克·奈特：《毛泽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王应一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页。